



思想理论战线
Front of Thought and Theory
ISSN 1001-9774, CN 31-2184/D

《思想理论战线》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特点、根源与影响
作者： 刘中民，聂干程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5-25
引用格式： 刘中民，聂干程.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特点、根源与影响[J/OL]. 思想理论战线. <https://link.cnki.net/urlid/31.2184.D.20260522.1343.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特点、根源与影响

刘中民, 聂千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摘要: 2026年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随即发起反击, 双方冲突爆发并迅速升级为近年来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战争。从性质上说, 这场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表现形式, 是中东地区霸权国家以色列与全球霸权国家美国利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打击“抵抗阵线”形成的战略优势, 对其主要对手伊朗进行的“总清算”, 是美以霸权力量与伊朗领导的反美阵营之间的“总较量”。在特点方面, 美以与伊朗战争呈现出多元行为体深度介入、冲突持续外溢、作战方式高度复合、战争影响联动递进的显著特征。战争的根源异常复杂, 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矛盾激化是近期原因, 美以国内政治保守化是中期原因,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以与伊朗从友好合作走向敌对是长期原因。战争的影响巨大而深刻, 它不仅对伊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深刻冲击, 也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产生广泛负面影响。

关键词: 美以对伊朗战争; 战争特点; 战争根源; 战争影响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2026年2月28日, 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史诗之怒”(Operation Epic Fury)和“咆哮之狮”(Operation Lion's Roar)的军事打击。作为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起代号为“真实承诺4”(Operation True Promise IV)的报复行动。自此, 美以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 中东陷入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地区冲突中。

战争爆发后, 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 攻击目标也从最初的军事设施扩展至经济与民生领域, 博弈焦点也从早期围绕政权更迭与核问题, 日益转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这一更具地区与全球影响的新生议题。临近3月末, 随着冲突各方愈发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 有关各方开始在外部的斡旋下寻求有限接触, 美以与伊朗战争由此进入新阶段。2026年4月8日, 在巴基斯坦斡旋下, 美伊达成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协议; 4月11日, 双方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 谈判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当代中东对外关系研究”(25FGJA003)

作者简介: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聂千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谈判前后美伊双方表态来看,双方在海峡通行、“抵抗阵线”以及核问题上立场分歧严重。谈判失败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立即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反向封锁”,各方博弈重心进一步向海上转移。此后,双方围绕开启新一轮谈判相互进行接触与试探,然而在美国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反向封锁”的前提下,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拒绝谈判。最终,在4月22日美伊临时停火到期之际,特朗普宣布单方面延长停火期限,但仍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状态。总体来看,这场美以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极有可能陷入“不战不和”的“烂尾式”结局中。

就战争本质而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侵略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是为中东政治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问题相互作用、联动演化产生的重大危机,是中东地区霸权国家以色列与全球霸权国家美国利用新一轮巴以冲突来打击“抵抗阵线”形成的战略优势,并对其主要对手伊朗进行“总清算”,体现着美以霸权力量与伊朗领导的反美阵营之间的“总较量”;战争的根本目标是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进而彻底消除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和美国地区霸权的障碍,确立由美以主导、阿拉伯国家参与、伊朗被动接受的中东地区新秩序^①。就战争特点而言,此次冲突突破了传统国家间战争范畴,呈现出多元主体深度介入、冲突范围持续扩大、作战方式高度复合以及战争影响联动递进的显著特征。就战争根源而言,此次冲突具有清晰的层次性与阶段性逻辑,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矛盾激化是近期原因;以色列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保守化是中期原因;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以与伊朗从友好合作走向长期敌对是长期原因。就战争影响而言,冲突当事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均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不仅对伊朗、以色列和美国的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军事安全、政治决策乃至国家战略造成明显冲击,亦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造成负面影响。进一步看,战争从根本上揭示出“伊朗之困”“以色列之困”“美国之困”“中东之困”乃至“世界之困”。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战争特点、战争根源与战争影响三个维度,对此次美以与伊朗战争所呈现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战争所揭示出的深层困境。

一、美以对伊朗战争的特点

不同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此次美以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冲突主体与内容的广泛性、作战方式的复合性,以及战争影响的联动性与递进性。

(一)冲突主体与内容的广泛性

从冲突主体来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均深度卷入,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多层次参与格局。在国家行为体方面,除直接参战的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亦不同程度受到波及,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以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都收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美以空袭发生后,伊朗方面明确警告,任何为以色列提供支持的地区军事基地均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②。在此情形下,自2月28日起,周边国家陆续遭到来自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甚至位于印度洋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亦未能幸免。甚至有分析据此指出,“除伊比利亚半岛外,北约多数成员国均已进入伊朗潜在打击范围”^③。

在非国家行为体方面,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resistance front)成员与伊朗协同作战,对美国与以色列展开多方向攻击。“抵抗阵线”是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出于输出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革

^①刘中民:《表层冲突烈火焚烧,深层矛盾坚如寒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表与里》,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819345。(2026-04-10)

^②Patrick Wintour, “Iran vows ‘no leniency’ as it launches reprisal attacks on Israel and US air base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feb/28/iran-vows-no-leniency-reprisal-attacks-israel-us-air-bases>。(2026-04-09)

^③Can Kasapoğlu, “Iran’s Attempted Strike on Diego Garcia and the Emerging Strategic Threat,” Hudson Institute, Mar 2026,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irans-attempted-strike-diego-garcia-emerging-strategic-threat-can-kasapoglu>。(2026-04-09)

命理想与反对美以孤立围堵、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与部分国家和武装组织结成的地区联盟^①。在“抵抗阵线”鼎盛时期,其组织成员主要包括由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伊朗遇袭后,“抵抗阵线”中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率先对本国美军基地及外交机构实施打击;真主党亦迅速跟进,其组织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真主党不会离开“荣誉与抵抗的战场”,并“将履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职责”^②。自3月2日起,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至4月初已累计发动打击逾1300次^③。黎巴嫩也因此遭到以色列严重打击,导致2000余人丧生,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在战争初期表现较为克制,但于2026年3月28日正式参战,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标志着“抵抗阵线”现存三大核心力量全面介入。至此,冲突呈现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多线交织的复杂态势。

从冲突内容来看,打击对象呈现不断扩展的特点,并由初期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基础设施乃至民生系统。冲突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打击重点在于削弱伊朗海军与导弹能力、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并阻断其对外支持地区代理人的能力。^④在此框架下,美以对伊朗境内逾千个军事目标实施密集空袭。^⑤作为回应,伊朗通过不对称作战方式,利用无人机与弹道导弹,对以色列军事目标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广泛打击。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双方交战力度空前,但民用目标并不在各方作战计划之中。冲突的转折点出现在2026年3月19日。当日,以色列空袭了位于波斯湾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该气田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对伊朗能源产业具有关键意义。此举引发伊朗强烈反应,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将把海湾地区与美国相关的能源设施视同军事目标予以打击^⑥。此后,打击目标迅速蔓延至地区能源体系。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天然气设施被迫停运,以色列北部海法炼油厂遭导弹打击,其他海湾国家也有拦截来袭飞行物的报告。临近4月,打击对象进一步扩展至民生基础设施领域。4月2日,美国对伊朗德黑兰—卡拉季交通走廊核心路段实施打击;4月5日,伊朗通过无人机袭击科威特两处电力及海水淡化设施。伴随战争延宕,双方的打击对象已从军事、安全领域扩展至能源、交通、电力及水资源等关键民生领域,呈现出高度综合化特征。

(二)作战方式的复合性

美以与伊朗的此番较量,呈现出战争行动与“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相结合的复合式作战特征。一方面,正面战场的军事对抗仍是冲突核心。在空中领域,尽管美以拥有显著优势,但伊朗仍依托地面防空体系对美以空天力量进行顽强抵抗。例如,2026年4月3日,伊朗方面击落一架美军F-15E战斗机,随后双方围绕机组幸存人员展开激烈争夺;在上述过程中,又有两架美军直升机因参与营救行动,遭到伊朗地面武器攻击^⑦。在海上战场,开战初期,美国潜艇曾在印度洋击沉一艘伊朗军舰。此后,随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及其盟友经济造成冲击,美国从全球范围向中东地

^①参见刘中民:《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研究——以中东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22年第5期;金良祥:《伊朗抵抗战略受挫及其对中东地区秩序的影响》,《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②Tucker Reals, "Lebanon's Hezbollah vows to 'confront aggression' of U.S. and Israel," CBS News, March 2026, <https://www.cbsnews.com/live-updates/us-iran-war-israel-supreme-leader-khamenei-funeral-day-2/>. (2026-04-09)

^③程帅朋、胡冠:《“重伤”的黎真主党何以对以军频造杀伤》,新华网,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405/aa22cd88c033407088a88ea7bd3963ff/c.html>. (2026-04-09)

^④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Clear and Unchanging Objectives Drive Decisive Success Against Iranian Regime," April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4/president-trumps-clear-and-unchanging-objectives-drive-decisive-success-against-iranian-regime/>. (2026-04-10)

^⑤Gary Warner, "US uses over 20 weapons to hit more than 1,000 targets in attack on Iran," Stars and Stripes, March 2026,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middle_east/2026-03-01/weapons-iran-20922986.html. (2026-04-10)

^⑥Amichai Stein, "Iranian gas, oil infrastructure at Iran's South Pars and Asaluyeh hit in Israeli air strike,"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2026,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iran-news/article-890393>. (2026-04-10)

^⑦新华社:《美军一天之内两架战机被击落 两架直升机被击中》,新华网,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404/dbe055e8309d4293b385c62c89e47e61/c.html>. (2026-04-14)

区持续集结海军陆战队和舰艇力量,意图对伊朗进行威慑并准备随时夺取霍尔木兹海峡^①。2026年4月11日,美伊代表在巴基斯坦谈判期间,两艘美国军舰试图闯入波斯湾,被伊朗海军驱离^②。此后,随着美国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反向封锁”,双方海上力量围绕海峡通行问题展开进一步博弈。

另一方面,美以对伊朗高层实施了系统性的“定点清除”。参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义,“定点清除”是指国家或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和平时期以及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通过无人机、狙击手开火、近距离射击、导弹、汽车炸弹、毒药等方式,对特定对象预谋实施的致命打击^③。以色列是最早公开采用并推动“定点清除”合法化的国家之一^④。自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这一策略逐渐常态化,并在近年来被美国与以色列广泛用于打击伊朗及其地区代理力量的军政高层,使得战争主体、战争对象、战争场所的界限日益模糊,对国际法和战争伦理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⑤。

在本轮冲突中,美以依托对伊朗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长期渗透,并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对伊斯兰政权高层实施了高精度打击。据统计,仅开战首日即有40余名伊朗高级官员遭到清除,其中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震动。^⑥此后,更多被“定点清除”的伊朗军政要员被陆续披露,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萨维、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最高领袖国家安全顾问阿里·沙姆哈尼、情报部长埃斯梅尔·哈提卜、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高级顾问阿里·拉里贾尼,以及巴斯民兵总司令戈拉姆雷扎·苏莱曼尼等。

伊朗大批实权派军政要员死亡,凸显了本轮战争的残酷性,也对伊朗军事与政治结构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行踪的详细信息被“敌对国家”清楚掌握,也暴露出伊朗在情报与安全体系方面长期存在严重漏洞,以至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在正式当选之后,迟迟没有露面。可以预见,战争结束后,安全领域将大概率成为伊朗国家重建的重点。

(三)战争影响的联动性与递进性

国际政治具有系统效应,“人们不能从愿望和期望中推断出结果”^⑦。美以与伊朗战争的冲击并未简单局限于交战各方,而是通过多重传导机制在中东地区格局、世界经济、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等层面产生连锁反应,集中体现出此次冲突影响的联动性与递进性特征。

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为例。霍尔木兹海峡北临伊朗、南接阿曼,是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并通向印度洋的唯一海上通道。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该海峡是中东部分产油国能源出口的重要乃至唯一通道,被称为“世界能源咽喉”,对全球能源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上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⑧。2月28日美以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晚即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使该海峡在事实上进入封闭状态^⑨。作为对美以袭击的报复性措施,此举直接导致千余艘货轮滞留波斯湾,对全球供应链与国际贸易造成重大

^①新华社:《美媒:美正向中东增派海军陆战队和军舰》,新华网, <https://www3.xinhuanet.com/world/20260314/8722151fe3844c4786a8babdd3779a1d/c.html>。(2026-04-10)

^②新华社:《伊朗媒体还原美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失败的细节》,新华网, <https://www3.xinhuanet.com/world/20260413/bf45ad7d4a4c4321bcf70d927ca959bf/c.html>。(2026-04-14)

^③“Use of armed drones for targeted killings: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Document A/HRC/44/38, August 15, 2020.

^④吴昊昱:《争议中的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1期。

^⑤吴昊昱:《争议中的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1期;刘中民:《表层冲突烈火焚烧,深层矛盾坚如寒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表与里》,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819345。(2026-04-10)

^⑥Morgan Phillips and Efrat Lachter, “Trump says Iran’s succession bench wiped out as Israeli strike hits leadership deliberations,” Fox News, March 2026,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says-irans-succession-bench-wiped-out-israeli-strike-hits-leadership-deliberations>。(2026-04-10)

^⑦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3-108页。

^⑧U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Strait of Hormuz disruption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strait-hormuz-disruptions-implications-global-trade-and-development>。(2026-04-10)

^⑨新华社:《美以袭击致近千人伤亡 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网, <https://www3.xinhuanet.com/world/20260301/263abd7fa56546309f8dc949e44f71d9/c.html>。(2026-04-10)

冲击,并引发世界石油、天然气及电力价格上涨。受此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很快从冲突前每桶72美元,攀升至每桶100美元左右^①。更为严重的是,上游能源价格攀升又沿产业链进一步向食品、交通等下游领域传导,显著加剧各国通胀压力,并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导致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波斯湾航线瘫痪的影响还经由世界经济进一步扩展至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层面。作为全球重要能源供应方,俄罗斯在此次冲突中获得相对利好。海峡封锁后,部分国家转而与俄罗斯接洽能源采购,美国也对“已装载并准备出口的俄罗斯石油”实施阶段性制裁豁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因俄乌冲突承受的经济压力^②。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战略裂痕亦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针对伊朗对海峡的封锁,美国方面于3月12日提出组建护航联盟以维持海峡通行,但其盟友普遍反应冷淡^③。英国首相斯塔默直言“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美国不能在缺乏协商的情况下指责盟友支持不足”^④。对于盟友的不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达不满,甚至一度威胁退出北约。但在美国被以色列裹挟进入冲突、盟友自身安全与经济脆弱性上升的背景下,双方战略利益分歧已日益凸显,盟友难以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

2026年3月末,随着战场形势变化,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表示“可能对曼德海峡进行封锁”^⑤。作为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关键节点,一旦曼德海峡瘫痪,世界经济将遭受进一步冲击,并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瘫痪产生联动效应,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造成更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综上所述,本轮美以与伊朗的战争不断由局部军事对抗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演化,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多元主体深度介入、冲突不断外溢、作战方式高度复合以及战争影响联动递进的特点。事实上,上述表征性变化并非孤立生成,而是深嵌于中东地区长期累积的地缘政治矛盾、安全困境与各方战略博弈之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回溯本轮冲突的深层根源,探究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升级的幕后动因。

二、美以对伊朗战争的根源

美以与伊朗战争的根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它在根源上几乎涉及中东所有盘根错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伊朗“输出革命”问题、伊朗核问题、美以与伊朗的历史恩怨、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美国与海湾国家盟友关系等。具体来看,美以与伊朗战争的根源可以归纳为一个近期原因、一个中期原因和两个长期原因。

(一)近期原因: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矛盾激化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伊朗与“抵抗阵线”各成员间缺乏正式合作条约,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这一网络的主要纽带^⑥。因此,“抵抗阵线”与以色列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坚持反以立场,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敌人”^⑦。哈马斯诞生

^① Investing. Com, “Brent Oil Futures Historical Data,” <https://www.investing.com/commodities/brent-oil-historical-data>. (2026-04-14)

^② Nina Montagu-Smith, “Will Russian oil be the biggest winner in the US-Israel war on Iran?,” Aljazeera, March 2026,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6/3/20/will-russian-oil-be-the-biggest-winner-in-the-us-israel-war-on-iran>. (2026-04-10)

^③ William James and Ismail Shakil, “US Navy could escort vessels in Strait of Hormuz with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Bessent says,” Reuters, March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navy-could-escort-vessels-strait-hormuz-with-international-coalition-bessent-2026-03-12/>. (2026-04-11)

^④ Dave Burke and Ashley Cowburn, “Keir Starmer Insists Iran Conflict ‘Not Our War’ As He Blasts Reform Chief Nigel Farage,” The Mirror, March 2026, <https://www.mirror.co.uk/news/politics/keir-starmer-insists-iran-conflict-36942740>. (2026-04-11); Brian Melley, “European leaders urge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as Iran closes the Strait of Hormuz,” AP News, April 2026, <https://apnews.com/article/iran-europe-eu-hormuz-lebanon-macron-meloni-merz-5c49b81c89bc694207db8e07ceba70ea>. (2026-04-11)

^⑤ 新华社:《也门胡塞武装称可能封锁曼德海峡》,新华网, <https://www3.xinhuanet.com/20260320/88a846f993cd49e5bc70da38b2141b5b/c.html>. (2026-04-17)

^⑥ 金良祥:《伊朗抵抗战略受挫及其对中东地区秩序的影响》,《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⑦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页。

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为目标，坚决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则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扶植建立，其组织信条同样以反美、反以为核心^①。叙利亚在历史上多次参与对以战争，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复兴党意识形态影响下，加之1967年“六日战争”后遗留的戈兰高地问题，阿萨德政权长期与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最后，也门胡塞武装虽与伊朗保持一定距离，但亦曾公开表达强烈反以立场^②。由此可见，以色列与“抵抗阵线”长期敌对，为日后双方矛盾激化埋下伏笔。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突袭以色列南部，以色列迅速从空中和地面展开反击，新一轮巴以冲突全面爆发。在此轮冲突中，以色列与“抵抗阵线”对抗空前强化。一方面，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阵线”成员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哈马斯的支持^③。此后，“抵抗阵线”与以色列在叙事层面展开激烈交锋。另一方面，“抵抗阵线”主要成员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扩大。地面战场上，战争初期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为主，但自2024年9月起，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明显加剧^④。在空中与远程打击领域，不与以色列接壤的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发挥关键作用。胡塞武装自冲突初期即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从2023年11月开始袭击红海航道上的西方船只^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也从以往的“暗战”逐步升级为直接相互打击的公开对抗^⑥。双方分别于2024年4月、10月及2025年6月相互发射导弹袭击对方本土，冲突规模呈递进式扩大。

尽管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及伊朗从多个方向对以色列形成一定牵制，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地区与国际支持有限，以及核心成员伊朗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抵抗阵线”的整体军事效能受到严重制约，难以对以色列造成实质性伤害，反而在以色列强力反击中遭受重创^⑦。2023年10月以来，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损失惨重，其军政高层，包括哈尼亚、纳斯鲁拉、辛瓦尔等人相继遭以色列“斩首”；胡塞武装亦在美以多轮空袭中被明显削弱。更令人意外的是，由于以色列对“抵抗阵线”打击使长期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真主党元气大伤，而俄罗斯又深陷乌克兰战场无法自拔，失去外部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在沙姆解放组织等反政府武装的攻击下于短时间内迅速崩解，致使“抵抗阵线”出现结构性断裂^⑧。最后，在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中，伊朗核设施与军事设施遭受严重打击，数十名高级将领及核科学家遇袭身亡^⑨。在此情形下，“抵抗阵线”部分成员在短期内丧失作战能力，组织整体地区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政治影响力亦显著下降。

在“抵抗阵线”受挫之际，伊朗日益缺乏威慑以色列的有效手段，且其在与以色列的几次直接冲突中并未展现出坚定的抵抗意志。在国内，本土遭袭与长期制裁引发的经济困境、民生压力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最终于2025年年底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上述情形使美以认为伊朗处于内部最虚

①Nadim Ladki, "Hezbollah cuts Islamist rhetoric in new manifesto," Reuters, December 200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hezbollah-cuts-islamist-rhetoric-in-new-manifesto-idUSTRE5AT3VK/>. (2026-04-12)

②参见 Victoria Clark, *Yemen: Dancing on the Heads of Snakes*,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50.

③Cleary Waldo, Gabriel Epstein, Sydney Hilbush, ed.,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the Hamas Attack on Israel,"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202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nternational-reactions-hamas-attack-israel>. (2026-04-12)

④刘中民：《战争还是和平？两大矛盾困境决定巴以冲突的走向》，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218084. (2026-04-10)

⑤Reuters, *Yemen's Houthis conduc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Gulf of Aden, Israel's Eilat, July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yemens-houthis-say-they-conducted-military-operations-gulf-aden-israels-eilat-2024-07-14/>. (2026-04-12)

⑥刘中民：《战争还是和平？两大矛盾困境决定巴以冲突的走向》，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218084. (2026-04-10)

⑦刘中民：《辛瓦尔被杀后，本轮巴以冲突或已接近关键拐点》，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91856. (2026-04-12)；金良祥：《伊朗抵抗战略受挫及其对中东地区秩序的影响》，第98-103页。

⑧刘中民：《叙利亚变天，中东大棋盘将迎来怎样的地缘政治冲击？》，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613949. (2026-04-12)；康欣、雷婧莹：《失控的代理人？伊朗“抵抗轴心”发展新趋势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6期。

⑨The Jerusalem Post, "IDF releases details of damage to Iran's nuclear, missile production sites," June 2025,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defense-news/article-859236>. (2026-04-12)

弱的时刻。在此背景下,向来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政策的特朗普政府,持续向海湾地区集结军事力量,试图趁机将伊朗逼到谈判桌上,一举解决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2026年2月初,在外部巨大压力下,伊朗不得不在“十二日战争”中遭美以欺骗后再度同意开启谈判。然而,伊朗的让步并无法满足美以不断膨胀的战略野心。当美伊谈判即将达成协议之际,在以色列的煽动和蛊惑下,特朗普政府最终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突袭。

因此,美以与伊朗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抵抗阵线”被削弱后以色列和美国力图进一步削弱伊朗乃至颠覆伊朗政权的政策结果。

(二)中期原因:以色列和美国政治的保守化

以色列政治保守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年,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巴以和平进程受到重大打击;进入21世纪,巴以冲突持续升级,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自杀式袭击频发,以色列社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民众对安全议题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在安全问题上立场更为强硬的右翼政治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源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右翼安全观上升为社会共识^①。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犹太“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犹太复国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合法性,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②。基于此,以色列右翼集团反对左翼力量通过谈判实现巴以和平,强调以强制性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相较之下,以色列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持续下降,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长期处于历史低位^③。

在这一趋势下,由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被外界普遍视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为保守、右倾程度最高的内阁政府于2022年上台执政^④。总理本人的保守理念与维系执政联盟中右翼及极右翼政党支持的政治需求相互叠加,使该届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极具扩张主义的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断加快犹太人定居点扩建步伐,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国内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更加强势。为迎合民意,内塔尼亚胡除提出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实现加沙地带去军事化与去极端化三大目标外,还明确否认“两国方案”,并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提及“大以色列”构想^⑤。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将伊朗视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威胁,认为伊斯兰政权是“中东大多数问题根源”^⑥。相较于美国在对伊政策和战争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内塔尼亚胡政府立场更为激进,主张要“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伊斯兰政权^⑦。因此,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不顾外界反对坚决打击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并在游说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然而,不能简单夸大以色列因素在美国对伊朗动武决策中的作用。美国政坛保守化趋势在特朗

①王戎、李志博:《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研究:内涵、机制与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3期。

②刘中民、王利莘:《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③吴诗尧:《小插曲还是大趋势——近年来以色列主要左翼政党政坛边缘化论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1期。

④Raffi Berg, “Israel's most right-wing government agreed under Benjamin Netanyahu,” BBC News, December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63942616>. (2026-04-13)

⑤“大以色列”构想可追溯至《圣经》中的“应许之地”,主张建立一个西起尼罗河东到幼发拉底河,涵盖现今多个阿拉伯国家领土的犹太国家。关于内塔尼亚胡接受采访,参见The Guardian, “Netanyahu tells US he opposes crea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 after Gaza war,” January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jan/18/netanyahu-tells-us-opposes-palestinian-state-after-gaza-war>. (2026-04-13); The Times of Israel, “Netanyahu says he's on a ‘historic and spiritual mission,’ also feels a connection to vision of Greater Israel,” August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netanyahu-says-hes-on-a-historic-and-spiritual-mission-endorses-vision-of-greater-israel/. (2026-04-13)

⑥Maya Orbach, “New IDF chief pledges to keep politics out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Jewish Chronicle, January 2023, <https://www.thejc.com/news/israel/new-idf-chief-pledges-to-keep-politics-out-of-the-armed-forces-lb21i8rz>. (2026-04-13)

⑦唐志超:《美以对伊朗动武的动因及其战略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 Policy Studies, “Iran Protests Stir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s and Conflicting Interests,” January 2026, <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Lists/ACRPS-PDFDocumentLibrary/international-interests-in-iran-protests-en.pdf>. (2026-04-13); Michael Herzog, “On War with Iran, a U.S.-Israeli Division of Labor?,”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February 2026,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war-iran-us-israeli-division-labor>. (2026-04-13)

普时期得到进一步延续,与以色列政坛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形成共振,构成了双方联手打击伊朗的重要动因。

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时期,并在二战后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经济滞胀、政府信任危机、冷战压力加剧与社会文化反弹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开启了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①。对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以色列具有独特价值。一方面,在保守主义“文明优越”与“民主价值”叙事下,以色列被视为中东地区的“民主灯塔”;另一方面,在保守主义的宗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眼中,支持以色列具有非凡宗教意义^②。

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理念。与保守主义其他分支相比,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扩张性逻辑^③。在此背景下,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实行干涉主义政策的重要伙伴与战略抓手,而伊朗伊斯兰政权既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存在冲突,也在地缘战略层面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仇视的敌人。基于此,在小布什时期,美国一边在政治与军事层面给予以色列高度支持,一边将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对其进行遏制。这一政策基调亦在特朗普时期得到延续。

特朗普上台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与移民问题的冲击下,保守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双重驱动的结果,是美国政治保守化的最新体现^④。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被冠以老式重商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性霸权主义等称号,被外界概括为“唐罗主义”,其特点是偏好直接军事介入、极限施压、经济胁迫,甚至谋求领土扩张,核心是利用美国特权地位,通过控制盟友和征服对手,在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中追求眼前利益,具有浓厚保守主义底色^⑤。对于中东问题,深受基督教福音派影响的两届特朗普政府维持了高度偏袒以色列、极限施压伊朗的政策基调。而特朗普政府的亲以政策,不但增强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政策上维持强硬立场的政治底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对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实行最大限度打击,也契合美以双方保守力量的意识形态与地区霸权诉求。最终,美国和以色列形成高度一致,在双方国内保守主义力量的牵引下陷入战争泥潭。

因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层面,以色列和美国政治的保守化,尤其是以色列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即特朗普“唐罗主义”的合流,使美以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色彩不断凸显,打击伊朗遂成为美以保守主义力量的共同目标。

(三)长期原因: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第一,美国与伊朗长期的敌对与对抗。

从长期的角度看,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由单一议题触发,而是植根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双方围绕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尤其是核问题的对抗,进而形成了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全面对抗的结构性矛盾。

在历史上,伊朗与美国的系统性交往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当时伊朗深受英国与苏联的控制。为制衡两大列强影响,礼萨·汗掌权后推行“第三国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即在英苏双重压力下,引入地理上相对遥远、且与伊朗利益冲突较小的第三方强国,以实现

^①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7, pp.7-8; 李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②张文宗、王苏舆:《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美国研究》2024年第6期。

^③李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田旭:《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④参见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王希:《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历史反思》,《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史泽华:《“特朗普主义”再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外交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2期。

^⑤参见田旭:《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严谨、王飞:《“新门罗主义”的内涵、缘起和前景初探》,《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5期;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掠夺性霸权的形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2期;刘丰:《从仁慈盟主到掠夺霸权:“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联盟战略》,《外交评论》2026年第1期;赵明昊:《“唐罗主义”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重塑》,《国际关系研究》2026年第1期。

对英苏势力的平衡并维护国家主权^①。在“第三国外交”战略指导下,巴列维王朝开始接触美国,但由于彼时美国国力有限且受英苏阻挠,初期合作未能取得实质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迅速扩大在伊朗影响,并于1943年与英苏签署《德黑兰宣言》,试图防止伊朗战后被英苏瓜分^②。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在两极格局下,巴列维王朝全面倒向美国。在外交方面,伊朗接受美国大量军事援助,并于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于1959年同美国签署双边军事合作协定^③。在内政方面,巴列维政权在英美帮助下于20世纪50年代推翻摩萨德民族主义政府,后又受肯尼迪政府鼓动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被称为“白色革命”的激进社会改革。在本质上,巴列维政权追随美国是为了维护统治。然而,高度依附美国的政策路径,尤其是在英美情报机构支持下推翻摩萨德政府,使巴列维政权在国内被视为美国代理人,激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上述情形与“白色革命”失败造成的社会危机相互影响,使伊朗政治局势持续恶化。1979年,伊朗爆发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并建立奉行伊斯兰主义路线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霍梅尼思想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霍梅尼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④。其一是反国际体系思想。霍梅尼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有缺陷的人的思想产品”,当今世界实质上已被划分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两部分,“被压迫者”应当团结在伊斯兰旗帜下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⑤其二是“输出革命”思想。该思想是霍梅尼反国际体系思想的自然延伸,核心逻辑是,在不合理的国际体系下,率先完成伊斯兰革命的伊朗有义务将伊斯兰制度输出至所有伊斯兰国家,进而在更大范围实现伊斯兰秩序^⑥。受此影响,伊朗视美国为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始作俑者,是伊朗“最大问题”,并被霍梅尼称为“大撒旦”(大恶魔);而美国也同样视伊斯兰政权为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重大威胁,双方关系因此迅速恶化^⑦。1979年11月,美伊爆发人质危机,数十名美国驻伊朗外交人员被扣押。1980年4月,美国宣布同伊朗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此后,随着两伊战争爆发,美国给予伊朗对手伊拉克相当程度的支持,而伊朗则与美国在海上展开直接对抗。

1989年霍梅尼去世,伊朗进入阿里·哈梅内伊时代。在后冷战时期,伊朗外交实践中意识形态因素有所下降,但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依然将美国视为“伊斯兰教最大敌人”。^⑧在此背景下,斗争与对抗仍然是两国互动主旋律。克林顿时期,美国推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战略,而伊朗则持续输出革命,借助伊斯兰意识形态拓展地区影响力^⑨。2002年伊朗核计划曝光后,美国及其盟友长期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伊朗则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通过“抵抗经济”增强抗压能力^⑩。2015年的“伊核协议”曾一度使美伊关系有所缓和。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行“极限施压”政策,美国于2018年退出了“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作为回应,伊朗逐步恢复核开发,并大大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围绕“抵抗阵线”,伊朗曾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过渡问题、2006年黎以冲突等方面展开博弈。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又成为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友斗争的重要场域。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伊朗态度强硬,除对“抵抗阵线”各成员进行打击,美国还将伊朗伊斯

①陈万里、杨明星:《伊朗“第三国外交战略”的历史考察》,《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

②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③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

④刘中民:《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

⑤Farhang Rajaee, *Islamic Values and World View: Khomeini on Ma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3, pp. 77-81.

⑥刘中民:《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

⑦Ruholla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mid Algar,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1, p. 188.

⑧王泽壮、赵锦浩:《哈梅内伊外交思想探析》,《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

⑨刘中民:《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

⑩关于“抵抗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伊朗建设“抵抗型经济”的要点》, https://ir.mofcom.gov.cn/scdy/art/2014/art_85449b01c52b4cf9b9b76c6a57adf1e8.html. (2026-04-15)

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2020年，美国军方更是在伊拉克直接通过无人机击杀了伊朗“抵抗战略”关键人物卡西姆·苏莱曼尼。对此，伊朗除了为“抵抗阵线”各成员反击美国提供持续支持，还将美军中央司令部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在苏莱曼尼过世后对美军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以示报复。

由此可见，长期对抗使美伊之间矛盾不断累积，双方缺乏基本信任。2025年特朗普执政后，“极限施压”再度回归。在缺乏互信与缓和基础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单边施压与谈判一次性解决伊朗问题，此举无异于缘木求鱼^①。最终，在谈判渠道受阻、深层矛盾固化的背景下，战争成为能够打破美伊僵局的唯一选项^②。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整体战略收缩、基本排除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前提下，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具韧性。美国几乎不可能单纯依赖空中打击与海上封锁颠覆伊斯兰政权。最终，美伊必将在更深的历史积怨与安全困境中，重回谈判轨道。

第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反目成仇。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对峙，是此次美以与伊朗冲突爆发的直接诱因。然而，从历史与理性视角回溯两者关系可以发现，在波斯民族与犹太民族长达两千余年的交往中，对抗不过是短暂插曲，友好往来才是双方千年互动的主要内容。换言之，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并不天然存在“你死我活”的生存性矛盾，双方的敌意主要是1979年以来人为建构并不断强化的结果^③。

伊朗和以色列的交往可追溯至3 000多年前。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古犹太王国。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灭亡，大批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④。几乎同一时期，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550年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灭亡巴比伦，释放被囚犹太人，并允许其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此后，在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4-651年），大量遭受拜占庭迫害的犹太人进入波斯境内避难，再次受到优待。

进入近代，双方友好关系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延续。礼萨·汗执政期间，伊朗政府废除了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⑤。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尽管伊朗最初未予承认，但随着冷战格局形成，伊朗与以色列同为亲西方国家，且均面临来自苏联及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压力^⑥。由于拥有共同安全关切并得到美国支持，双方迅速展开合作，涉及军事安全、能源经贸等多个领域。在军事安全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与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协助训练军队，并于1956年帮助伊朗建立国家安全与情报机构（Savak）。在能源和经贸领域，由于以色列难以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石油，伊朗成为其主要供应来源。20世纪50年代初双方即签署石油协议，正是伊朗石油供应使以色列在1973年石油禁运期间基本未受直接冲击^⑦。此外，双方还在农业、水资源以及伊拉克犹太人迁移等问题上展开合作。

尽管伊以合作相对低调，但双方关系仍引发伊朗宗教势力不满。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对外政策上转向同时反美和反以。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背景下，双方仍保持一定务实合作，比如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并派遣顾问^⑧。以色列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亦在客观上有利于伊朗。事实上，伊朗与以色列反目成仇是在冷战之后，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①刘中民：《美伊就伊核问题谈判：不得不谈却又缘木求鱼》，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53986。(2026-04-15)

^②刘中民：《美以与伊朗博弈的混沌状态只能靠战争才能打破吗？》，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639434。(2026-04-15)

^③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0406。(2026-04-15)

^④参见 J. Maxwell Miller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⑤章波：《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战略关系的成因》，《西亚非洲》2007年第2期。

^⑥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0406。(2026-04-15)

^⑦Nizan Feldman, Elai Rettig, Ziv Rubinovitz, “Oil shocks and trade networks: How Israel, South Korea, and Poland leveraged oil imports to access new regional market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127, 2025, pp.1-15.

^⑧何志龙：《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早期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与以色列对抗的主体是阿拉伯国家。1967年“六日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持续通过“穿梭外交”等形式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在此背景下,阿以关系很大程度上与巴以矛盾分离,巴勒斯坦议题逐渐从阿拉伯国家的集体事业变为巴勒斯坦自身的问题。但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却扛起了反以的“大旗”。对于伊朗,反对以色列并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有利于其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道义制高点,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东和平进程对其造成的孤立,甚至还可以通过撬动巴以矛盾阻碍和平进程。基于此,伊朗一边批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和谈,一边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和其他“抵抗阵线”成员对抗以色列,以色列亦将伊朗视为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①。双方冲突逐步升级,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发展为直接对抗。

其次是伊朗核问题。“安全困境”是伊以核博弈的底层逻辑。所谓安全困境,是指一个国家为提高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对方反制,最终使所有国家都处于不安全之中^②。在伊核问题中,伊朗发展核能力旨在提升自身安全,但这一行为被以色列视为重大威胁,从而引发反制;而以色列反制又进一步强化伊朗核研发的动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具体而言,伊以围绕核问题的博弈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针锋相对,呈现循环报复的特点。比如,2021年纳坦兹核设施遭袭后,伊朗决定提高铀浓缩水平^③。而此举又招致以色列进一步打击,并最终发展到以色列伙同美国于2025年发动“十二日战争”。其二,双方围绕美国的伊核政策展开博弈。以色列试图推动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而伊朗则试图通过谈判缓解制裁并保留核能力。比如,以色列曾多次明确反对拜登政府与伊朗在奥地利就重返“伊核协议”进行谈判。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朗普时期,伊以核博弈的两个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动,即以色列与美国就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达成一致,导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伊关系恶化,而“伊核协议”失效又使伊朗加快核研发,伊以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的斗争因此更加激烈,显现出美伊关系恶化引发伊以对抗加剧的联动性。

最后是地区热点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中东局势的变化,地区格局中出现了“伊朗崛起”的态势^④。此后,“阿拉伯之春”为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使其势力更加接近以色列周边。面对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不断扩展,对自身安全极为敏感的以色列选择通过强力手段,对“抵抗阵线”进行持续打击,以求“推回”伊朗地区影响力。例如,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中,以色列便屡次对叙利亚境内伊朗阵营的军事力量发动空袭。在此背景下,双方矛盾不断加深,对抗日趋激烈^⑤。最终,伊朗和以色列冲突与对抗不断加剧,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化为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因此,此次战争是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从合作到对抗,双方矛盾不断累积、激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美以与伊朗战争并非突发性的单一军事冲突,而是多重历史积怨、现实矛盾与战略博弈长期累积和叠加的结果。这场战争既是巴以冲突外溢的产物,即伊朗因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也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以与伊朗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矛盾累积的产物。因此,客观公正地说,美以霸权扩张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并理应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同时,伊朗长期推行“输出革命”并扶植地区代理人网络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①BBC中文网:《简讯:巴勒斯坦与伊朗展开口水战》,2010年9月,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0/09/100905_brief_palestine_iran。(2026-04-16)

^②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1950, pp.157-180.

^③Parisa Hafezi, “Iran blames Israel for Natanz nuclear plant outage, vows revenge,” *Reuters*, April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ran-zarif-blames-israel-natanz-incident-vows-revenge-tv-2021-04-12/> (2026-04-16); Tasha Wibawa and Randolph Nogel, “Iran will enrich uranium up to 60 per cent. Here's why experts say it's part of a dangerous tit-for-tat with Israel,” *ABC News*, April 2021,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4-14/iran-nuclear-enrichment-natanz-60-per-cent-israel-cyber-attack/100067680>。(2026-04-15)

^④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⑤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0406。(2026-04-15)

剧了地区对立格局,反过来成为其自身遭受反制的重要原因^①。

三、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影响

美以与伊朗战争对交战当事方、海湾地区、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均产生重大影响,并深刻反映冲突当事方、中东地区以及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深层困境。

(一)战争对伊朗的影响与“伊朗之困”

战争对伊朗的影响兼具破坏性与重构性。从破坏性来看,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此次冲突中遭受严重冲击。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统计,截至4月初,战争已造成伊朗逾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机场、医院、住宅、学校等10余万处民用设施受损^②。原本在2025年年底引发大规模抗议的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以食品、烟草等基础商品为例,到3月底,其同比通胀率高达112.5%^③。但总体而言,尽管备受打击,伊朗经济仍展现出一定韧性,社会依旧维持基本运转^④。

从重构性来看,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伊朗军政体系在危机中重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战时“军事化”状态。战争爆发后,维护政权生存安全成为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抵御外部威胁、巩固政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外界普遍认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得以继任最高领袖,与其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紧密关系密不可分。^⑤当前,在外部安全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以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机构预计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其二,外敌入侵与国家领导人遇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粘合剂”,促使国内矛盾缓和并形成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什叶派反抗强权的宗教热情。在阿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数万名民众聚集于德黑兰,高呼反美、反以口号,悼念故亡领袖;有游行民众直言,“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必将誓死捍卫国家尊严”^⑥。此后,伊朗政权在新任最高领袖的带领下对内维持稳定、对外继续反击美以。

但是,对伊朗而言,更为长远的问题是,伊朗如何在战争结束后走出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伊朗之困”主要表现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伊朗所面对的内部发展困难,外部严重孤立,并因“输出革命”、扶植地区代理人屡遭地区国家反对以及美西方打击遏制的窘迫局面。究其根本,“伊朗之困”是伊斯兰主义道路遭遇挫折的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在世界多数国家进入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之际,仍固守战争与革命世界观的结果。1979年之后,伊朗对内执行伊斯兰革命路线,走上与世界世俗化、现代化大潮相悖的伊斯兰化道路;对外则陷入与伊拉克的战争、与海湾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对抗、与美西方的斗争之中^⑦。尽管这一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巴列维时期的专制与过度西化,但其后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走向矫枉过正,制约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因此,伊朗未来的出路在于解决内部发展与外部和平两大问题。在内部发展方面,伊朗需要处理好伊斯兰主义道路与经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张力。在伊斯兰体制框架下,强调物质发展易被视为对

^①刘中民:《表层冲突烈火焚烧,深层矛盾坚如寒冰: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表与里》,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819345。(2026-04-10)

^②OCHA,“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umanitarian Update No. 02,” April 2026,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iran-islamic-republic/islamic-republic-iran-humanitarian-update-no-02-3-april-2026#:~:text=Between%2017%20March%20and%203%20April%2C%20the%20humanitarian,West%20Azerbaijan%2C%20Kurdistan%2C%20Lorestan%2C%20Ilam%2C%20and%20Kermanshah%20provinces.> (2026-04-19)

^③Iran International,“Iran’s inflation surges further as consumer prices hit new highs,” March 2026, <https://www.iranintl.com/en/202603318527>。(2026-04-19)

^④陈霄、沙达提:《战火中的伊朗:破碎与希望》,环球杂志, <https://www1.xinhuanet.com/globe/20260415/6bcb291874e441c9bb3a18a0f95c06e9/c.html>。(2026-04-19)

^⑤黄泽民、李军、简妍:《哈梅内伊之子继任最高领袖 伊朗何去何从》,新华网, <https://www.news.cn/20260309/1e4b87247e9b4df38247a20a1d9f6705/c.html>。(2026-04-19)

^⑥新华社:《伊朗数万民众悼念哈梅内伊》,新华网, <https://www.news.cn/20260410/2dae2ce01c0b41468b89a05d708ebcb9/c.html>。(2026-04-19)

^⑦刘中民:《路在何方? 美以伊战争对伊朗影响的思考和追问》,澎湃新闻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913989。(2026-04-19)

革命精神的背离,使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层面先天受限^①。同时,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的全面伊斯兰化,也加剧了诸如宗教与世俗、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封闭等诸多矛盾。在外部和平方面,伊朗则需重新平衡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正如基辛格所言,伊朗必须回答其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②。过去数十年间,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实践使其与周边国家及西方关系持续紧张,多次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另外,在不解决意识形态等深层次矛盾的前提下,伊朗与美西方之间的关系亦难以彻底改善,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现实利益同样无法得到满足。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来看,在美西方和以色列的外部挤压下,伊朗将大概率变得更加激进与保守,如何从战争与革命走向和平与发展仍是伊朗面临的历史课题。

(二)战争对以色列的影响与“以色列之困”

战争对以色列经济、社会、安全均产生直接冲击。在经济层面,持续近两个月的冲突显著抬高以色列军费开支,对国家财政结构造成压力。为支撑战争,2026年3月,以色列内阁批准了修订后的国家财政预算。相比于此前版本,新版预算对民用开支进行了削减,并增加约103亿美元用于军事支出,同时将财政赤字目标由3.9%上调至5.1%,显示出战争成本的持续增加^③。与此同时,受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营商环境恶化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以色列财政部已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若冲突持续,经济前景将更加不容乐观^④。

在社会层面,持续不断的战争使以色列国内的民众不满情绪上升。一方面,部分民众认为伊朗的导弹与核能力尚未被摧毁,主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以彻底消除潜在威胁;另一方面,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长期动荡已使社会普遍产生疲惫情绪,加之高昂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以及人员伤亡,一部分民众倾向于停火止战。据民调显示,以色列民众对政府军事行动的支持率已从开战初期的近80%下跌至4月初的60%左右;另外,关于以色列是否应遵守美伊之间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大约有39%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41%的受访者则主张尊重停火协议^⑤。

在安全层面,战争短期内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但却使其长期面临的安全困境更加严重。一方面,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强有力打击,使其威胁在短期内显著下降。尤其是伊朗方面,其国防工业在冲突中遭受重创,大量弹道导弹储存设施及大部分武器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核能力亦受到打击^⑥。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拥有较为先进的防空体系,但冲突中仍有部分伊朗导弹突破防御,对以色列本土造成打击,暴露出其防御体系并非无懈可击^⑦。更为关键的是,伊朗政权并未发生崩溃,反而在冲突中展现出较强的抵抗韧性与反击能力。历经战争“淬炼”的伊朗政权,未来将成为以色列更加持久且难以应对的安全挑战。

竭力追求安全,却又始终无法实现安全,甚至愈发不安全,是以色列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即“以色列之困”。从历史经验看,犹太民族普遍存在较为深刻的不安全感。长期的离散处境,使犹太

①韩建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现代化研究》,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第405-406页。

②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

③Steven Scheer, "Israel cabinet OKs revised budget, cenbank says Iran war needs 'careful fiscal management'," Reuters, March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cabinet-oks-revised-budget-cenbank-says-iran-war-needs-careful-fiscal-2026-03-11/>. (2026-04-20)

④Steven Scheer, "Israel economy to grow 3.3% in 2026 if Iran war continues, finance ministry says," Reuters, March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economy-grow-3-3-2026-if-iran-war-continues-finance-ministry-says-2026-03-30/>. (2026-04-20)

⑤Emily Rose, "Israelis oppose Iran ceasefi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respect it, poll says," Reuters, April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israelis-oppose-iran-ceasefire-divided-over-whether-respect-it-poll-says-2026-04-13/>. (2026-04-20); The Economist, "Binyamin Netanyahu Is Down—but Not Out," March 2026,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6/03/30/binyamin-netanyahu-is-down-but-not-out>. (2026-04-20)

⑥Chris Panella, "The Pentagon says it's watching as Iran is 'digging out' its remaining missiles and launchers,"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02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ran-digging-out-remaining-missiles-launchers-pentagon-2026-4>. (2026-04-20)

⑦Sammy Westfall, Heidi Levine, Lior Soroka, "Iran's missiles pierce Israel's defenses, raising doubts about interceptor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2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6/03/25/iran-missiles-israel-air-defense/>. (2026-04-20)

人在他国社会中往往缺乏稳定安全保障；而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更是在其集体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又面临国土狭小、战略纵深不足、防御空间有限等客观约束，并长期处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与孤立之中。历史的痛苦与现实的残酷相互交织，使以色列人有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①。这种安全焦虑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对“绝对安全”的执著追求，其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安全目标的绝对性，即试图消除一切潜在威胁，追求环境完全可控与无害；其二，安全手段的单边性，即高度依赖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工具，频繁采取先发制人、“定点清除”等行动方式；其三，安全认知的排他性，即将自身安全与地区整体安全相割裂，对他国安全关切关注不足^②。

然而，正是这种“绝对安全观”在实践中不断加剧了以色列的安全困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③无论是物质安全还是本体安全，都不具备可分割性^④。以色列忽视安全本质特征，将自身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甚至以他国不安全为代价追求自身安全。上述逻辑不仅反复激化巴以冲突、伊以对立，也在更广泛的地区层面助推反以力量的动员与扩张，并阻滞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形成^⑤。其结果是，以色列越是强化安全投入与行动，敌人越多，主观不安全感反而越趋强化。

展望未来，走出“以色列之困”有赖于对“绝对安全观”的反思与调整，正视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不过，在国内政治保守化的背景下，以色列短期内实现战略转向的可能性不大。更令人担忧的是，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的持续追逐，可能进一步激发外部反制，从而恶化安全环境，并反过来推动其国内政治更加保守，形成内外互动的强化机制。因此，以色列走出“以色列之困”的前景不容乐观。

（三）战争对美国的影响与“美国之困”

战争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战争对美国经济运行构成持续压力。为支撑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在开战后不久即紧急申请2 000亿美元追加预算，白宫亦于2026年4月初提出下一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将进一步扩大自身预算赤字以及国债规模，使国家财政结构趋于失衡。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⑦。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物价水平持续走高，社会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据报道，受战争影响，2026年3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近四年最大涨幅^⑧。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引发民众不满，或将对共和党2026年的中期选举选情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战争对美国盟友体系构成冲击。战争爆发后，美国与北约盟友在军事介入问题上分歧明显、争论不断；中东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亦出现动摇。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启大规模驻军时代，其军事存在被地区盟友视为安全保障。然而，此次战争中，驻有美军的海湾国家反而成为伊朗打击报复的重要目标，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相关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对美依赖，寻求更加多元的安全合作伙伴。2026年4月11日，沙特国防部宣布，根据此前防御协议，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已驻扎在本国东部空军基地。^⑨可见，在盟友眼中，美国的安全保证已不再完全可信。

最后，战争打乱了美国全球战略部署。自2008年以来，美国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大国竞争，在中东

①陈双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环境、文化和实践》，《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②李绍先：《以色列“绝对安全观”与中东地区安全困境》，《当代世界》2026年第2期。

③王潇潇：《习近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人民网，<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2405041>。（2026-04-20）

④刘胜湘、唐探奇：《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兼论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⑤李绍先：《以色列“绝对安全观”与中东地区安全困境》，《当代世界》2026年第2期。

⑥Nolan D. McCaskill and David Morgan, “White House offers no hint of Iran war cost as it seeks military funding surge,” Reuters, April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white-house-offers-no-hint-iran-war-cost-it-seeks-military-funding-surge-2026-04-15/>。（2026-04-20）

⑦Nicole Jao, “US pump prices jump 30% since Middle East war began, headed toward \$4 a gallon,” Reuters, March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us-pump-prices-jump-30-since-middle-east-war-began-headed-toward-4-gallon-2026-03-19/>。（2026-04-20）

⑧Lucia Mutikani, “US consumer inflation hot in March amid record surge in gasoline prices,” Reuters, April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s-consumer-prices-surge-expected-march-2026-04-10/>。（2026-04-20）

⑨新华社：《巴基斯坦一支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空军基地》，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60411/c087d0ed4832433d87fa910ef9dc497b/c.html>。（2026-04-20）

地区呈现明显收缩态势。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将避免陷入在中东付出高昂代价的“永久战争”^①。然而,此次冲突中,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担心重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覆辙,迟迟不愿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参战;另一方面又难以接受伊朗政权仍具韧性、导弹与核能力未被彻底摧毁的现实,陷入“打不动、撤不出”的两难境地。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受到显著干扰,其欧亚战略受到中东战争的严重冲击与掣肘。

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中进退失据,正是当下美国霸权困境的集中体现。美国霸权困境是“美国之困”在国际层面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在相对实力下滑的背景下,不再愿意承担霸权义务,但仍坚持享受霸权特权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美国从“仁慈霸权”到“掠夺性霸权”的转向^②。具体到中东政策层面,这一矛盾更为突出。相对优势的缩水,使美国可动用的战略资源日益有限。在大国竞争上升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背景下,美国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对所谓“修正主义国家”的遏制中,从而不得不在中东地区推行战略收缩^③。但与此同时,美国又不甘心放弃对中东事务主导权,从而使地区政策与全球战略之间形成张力^④。

具体而言,为维持地区主导权,特朗普政府试图依靠“盟友分担机制”低成本维持霸权^⑤。一方面,美国试图提升以色列的地区主导作用,在降低美国直接投入的同时“保留影响中东地区局势的战略支点”;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与海湾盟友延续“石油换安全”的合作模式,从而继续“掠夺”战略资源^⑥。在此逻辑下,打击削弱伊朗及其“抵抗阵线”具有多重功能。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以色列在中东相对实力优势,巩固其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强化海湾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获取经济与战略收益^⑦。

但正是上述政策,使美国霸权战略在中东陷入困境。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与对伊朗阵营的持续打压,导致新一轮巴以冲突后地区权力格局出现明显失衡。以色列一家独大,战略野心不断膨胀,对外行动愈发激进,屡次打乱美国战略部署。2025年9月,以色列对同为美国盟友的卡塔尔实施了空袭。上述行为使美国地区盟友对以色列日益扩张产生焦虑,特朗普政府着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亚伯拉罕进程”也因此受挫。事实上,2025年和2026年两次发动对伊战争,美国都颇受以色列的战略拖累。另外,依然相对完整的“抵抗阵线”,可能在日后以更加激进的方式重返地区舞台。届时,更加激进的以色列与更加激进的伊朗阵营相互冲突,将使试图维持地区主导权的美国更加难以抽身中东。

在海湾盟友方面,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地区盟友的“掠夺性”政策,使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增强,并寻求与新兴大国开展多元合作。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加剧美国对外部力量“进入中东”的焦虑,使其在维持中东地区主导权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大国竞争之间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在此次战争中,美军的海湾盟友受到深度“牵连”,对美国安全信任度大幅下降,将进一步推动其战略自主。

放眼未来,“掠夺性霸权”路径根本无法改变美国日趋衰落的总体趋势。因为“一贯的掠夺性霸权政策,会导致美国全球影响力‘逐渐、然后突然’下滑”^⑧。美国执着于谋求霸权、维护霸权,大搞颠覆渗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026-04-20)

② 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掠夺性霸权的形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2期。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26-04-20)

④ 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1期。

⑤ 陈文鑫:《美以伊战争与美国“低成本维霸”的挫败》,《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

⑥ 刘丰:《从仁慈盟主到掠夺霸权:“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联盟战略》,《外交评论》2026年第1期。

⑦ 参见刘中民:《支离破碎、顾此失彼:特朗普2.0版中东政策与美国全球战略的矛盾》,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954164. (2026-04-21)

⑧ Stephen M. Walt,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predatory-hegemon-walt>. (2026-04-21)

透,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必将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贻害国际社会^①。

(四)战争对中东的影响与“中东之困”

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不仅对参战各方产生深远影响,也从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四个维度对整个中东地区造成系统性冲击。从发展维度看,战争使发展议题被严重边缘化,地区发展环境遭到破坏。伊朗对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引发周边国家经济与社会恐慌情绪,部分国家油气资源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突出,对海湾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产生负面影响^②。从安全维度看,战争显著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为未来冲突埋下隐患。首先,海湾国家不安全感加剧,战时沙特寻求巴基斯坦军事保护即为典型体现。其次,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打击将不可避免地在战后恶化与地区国家间关系,双方关系脆弱的缓和将受到冲击。最后,经过战争,以色列地区优势将进一步放大,其对外行为更加激进,也将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从文明维度看,战争激化了伊朗国内反美反以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之间本就脆弱的交流环境更趋恶化。从治理维度看,战争进一步加剧地区治理困境。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冲突中作用有限;无论是美以对伊朗动武,还是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打击,均严重背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国际法基本准则受到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国家在推动美以与伊朗停火止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巴基斯坦成为推动美以沟通的重要力量,“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伊朗邻国,也一直与美国、伊朗及调解人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③。上述现象揭示出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趋势。

综上所述,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以及文明赤字,使地区进一步陷入困境,即所谓“中东之困”。这一困境的形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因素看,西方列强的长期干涉是重要根源。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性,是列强在一战后基于《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划分势力范围的直接结果^④。正是“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⑤。二战后,美国霸权干涉又进一步加剧地区困境。^⑥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主导中东事务的主要域外力量。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美国频繁干涉地区国家内政、推动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对地区长期动荡负有重要责任。从内部因素看,在外部长期干预的背景下,地区内部领土边界争议、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民族宗教矛盾相互交织,复杂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催生出持续不断的冲突与热点问题^⑦。这些冲突首先削弱了地区发展基础,形成发展赤字;发展不足又反过来加剧冲突,诱发安全与和平赤字;而安全与和平的缺失进一步制约发展,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缺失,治理赤字不断扩大,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隔阂也不断加深。

2016年1月,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就“中东之问”给出中国答案:化解分歧,关键要加强对话;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道路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⑧。因此,未来摆脱“中东之困”,需要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反对霸权干涉;通过安全对话实现共同安全,通过文明交流超越

^①陈文鑫:《美以伊冲突背后的美国霸权困境》,求是网, <https://www.qstheory.cn/20260415/dc444d1e6f10426e9d9af2b77ac0ca31/c.html>。(2026-04-21)

^②Kamal Ahmed, “As War Continues to Rag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s the Latest to Postpone Gulf Conference in Saudi,” Fortune, March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3/24/war-world-economic-forum-wef-gulf-saudi-arabia/>。(2026-04-26)

^③Tuvan Gumrukcu, “Turkey urges “constructive” U.S.-Iran talks to end war,” Reuters, April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urkey-urges-constructive-us-iran-talks-end-war-2026-04-16/>。(2026-04-21); Saad Sayeed, “From international outcast to mediator in Iran war, Pakistan’s remarkable makeover,” Reuters, April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ternational-outcast-mediator-iran-war-pakistan-remarkable-makeover-2026-04-02/>。(2026-04-21)

^④刘中民:《2026年中东形势前瞻:两个中东的裂变》,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368113。(2026-04-21)

^⑤田文林:《西方霸权干涉下的“中东之困”及其出路》,《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⑥田文林:《西方霸权干涉下的“中东之困”及其出路》,《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⑦刘中民:《2026年中东形势前瞻:两个中东的裂变》,澎湃新闻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368113。(2026-04-21)

^⑧《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2页。

文明隔阂;坚持发展优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国际社会亦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参与地区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中东地区治理体系。

(五)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与“世界之困”

中东不稳,天下亦难安。从发展维度看,战争在短期内推高能源价格,加剧各国通胀压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掣肘。在中长期,冲突将推动油气出口国寻求出口路线多元化,减少对波斯湾航路的依赖;对于油气资源进口国,冲突不仅使这些国家“将更加重视油气进口多元化与资源储备,还将以安全思维谋划能源转型,突出新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①。从安全维度看,战争显著恶化了国际安全环境。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斩首”行动,以及交战各方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延伸至经济民生领域,为未来冲突开了危险先例,加剧国际关系滑向“丛林时代”的风险。同时,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与传统军事安全高度交织,使世界的安全困境更加突出;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在情报搜集与定点打击中作用凸显,使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的挑战更加突出。从文明维度看,冲突对全球文明交流环境产生负面冲击。部分国家内部“反犹”叙事显著扩散,战争爆发后,反犹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相关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增长^②。与此同时,“反伊朗”叙事也得到广泛传播。两种叙事针锋相对,使现实战争简化为身份对立,削弱了不同文明多元共处的基础。从治理维度看,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与美以伊战争叠加,使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屡遭冲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凸显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缺陷以及改革的紧迫性。

结语

美以与伊朗战争深刻体现了发展困境、安全困境、文明困境与治理困境,四大维度相互影响、联动演化共同构成当今世界困境,即“世界之困”。“世界之困”是百年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刻演变的产物,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共同作用的结果^③。本次美以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既是“世界之困”的直接体现,也通过战争进程加剧“世界之困”。破解“世界之困”,回答“世界之问”,离不开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推动更加包容、普惠以及更具韧性的全球发展^④。因此,各国应当共同践行普惠包容的发展观、共同合作的安全观、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以及公正合理的治理观,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吴爱军]

^①陆如泉:《美以伊战争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及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

^②Anti-Defamation League(ADL),“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Iranian Regime Fuels Wave of Antisemitic Conspiracy Theories, Calls for Mobilization,” March 2026, <https://www.adl.org/resources/article/military-operation-against-iranian-regime-fuels-wave-antisemitic-conspiracy>.(2026-04-22)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年版,第11-15页;参见高祖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903/c40531-40069535.html>.(2026-04-22)

^④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11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ershiguojituan_682134/zyjh_682144/202211/t20221115_10975346.shtml.(2026-04-22)